■ 政德镜鉴㊾

清代嘉庆道光时期，在官场整体风气趋向污浊不堪之时，却有一位刚正廉吏脱颖而出：他嫉贪如仇，遇贪必参，意欲匡正时弊，化解危机。虽屡为政敌构陷，以致遭厄几死，也始终“虽千万人，吾往矣”。

初彭龄：三黜三起，劾贪罹祸不言悔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本报通讯员 高洪菊

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“夜叉国”一篇中，曾借书中人物之口发自己心中之问：“何以为‘官’？”书中的对答也颇为巧妙形象：“官者，出则舆马，入则高堂，上一呼而下百诺，见者则目视，侧足立。”在蒲氏看来，官员出门前呼后拥、车马相从，入室高堂大屋、锦衣玉食。而为了官位的安稳，官员所要做的，是迎合帝心、和睦同僚，但由此而来的也是贪腐的迭次发生。

这大概是蒲松龄眼中的清朝官员形象。但其实在清代的官员群体中，有一位特立独行不合时俗的“异者”。他宦海浮沉，不为己身虑，而执着扫奸恶、廓腐败，虽遭顿挫亦不悔。他就是被称为官场“铜豌豆”的即墨籍廉吏初彭龄。

“初彭龄似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他纯粹得不能和官场恶习同流合污。所以他每到一处、每任一职，都要打击贪赃枉法、惩治腐败官员，是官员畏惧的猛虎。同时他也是一个孤单的人，很少看到和其他官员之间有友情的交往。而他的锐意反贪也招致同僚怨恨，以致被人构陷无辜下狱。如果没有帝王的庇护，恐怕早已死于非命了，这也是封建社会廉吏反腐时常遭遇的宿命吧。”《即墨县志》副主编孙鹏说。

初彭龄书法

初入仕途先编书

初彭龄后来虽是令官员们胆战心惊的反贪名臣，但他的仕途其实是从“编书”工作开始的。

乾隆十四年（公元1749年），初彭龄出生于莱阳。4岁时，祖父元方在即墨购置了许多田宅，初家也顺势搬迁到了这里。

初氏是官宦人家，出仕者历代不乏其人，但所担任的一般都是地方的基层官吏。祖父历任过河南四个县、四川五个县的知县；伯祖父元美，也任过福建四个县的知县。

初彭龄的童年，在乡野和私塾度过。他少年聪慧，很早便中秀才，以“文思”闻名乡间。初彭龄22岁时，乾隆帝南下巡幸山东，驻跸于泰安。初彭龄得知这位自诩“稽古右文”的皇帝，喜欢途中阅览士子文章，便将平日所作的诗词文章集结成册，托人代为转呈。乾隆帝见其诗文辞藻雅丽、才情出众，赐他“举人”的头衔。这样初彭龄可以跳过乡试环节，直接赴京参加会试。

乾隆四十五年，是皇帝的七十寿辰。为了显示皇恩浩荡，清廷于此年开恩科取士。殿试中，初彭龄中二甲第五名，选入翰林院做了庶吉士，次年升为编修。而当时正是大型丛书《四库全书》编纂的高潮时期，需要大量学者官员参与。初彭龄初入仕途，便被遴选入编纂队伍，入了四库馆，和一众名臣共事。

《四库全书》不仅是官修百科丛书，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学术总结。此书规模庞大，参与修书者达360人之多，其中不乏声名卓著的大学者。初彭龄当时虽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翰林，但对工作极为负责，每日编纂校书总是一丝不苟，分外细心。

4年之后，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初步完成。乾隆帝决定对参与其中的123位年轻翰林进行一场考试，进而检验他们的才学高低，以奖优罚劣、循名责实。他依据文字优劣，将考卷分为四等。其中一等仅两人，二等则有35人，初彭龄就位列二等之中。对于二等人员，乾隆帝决定：“有未经升迁任用的，都记下名称与职务，等到有职位出缺便递奏上来。”

淡泊宁静的书斋生活又持续了4年。乾隆五十四年，初彭龄因修书之功调江西道御史，成为掌握监察权力的言官。

在御史任上，初彭龄的潜能得到极大释放，一跃成为“直言敢谏”的朝臣代表。

连劾重臣立威名

任御史不久，初彭龄就上疏弹劾重臣彭元瑞，一时朝堂震动。他用实际行动彰显了自己不惧权贵、嫉贪如仇的胆气。

彭元瑞当时任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，主管朝廷的人事安排，可谓是位高权重。但他品行却不检点，多次利用职务之便，为亲属谋取利益。御史言官虽然偶有耳闻，但因畏惧他的权势，总是放任不谈。初彭龄则不然，他获悉彭元瑞曾授意吏部主管户籍的官员，伪造材料帮助侄子顶替他人进入吏部工作。后来彭元瑞又故技重施，让不具资质的女婿冒名顶替进入武英殿从事校录。初彭龄便上疏弹劾，指出彭元瑞此举的危害，认为若重臣为官不为朝廷计，而是竞相效仿谋私利，国家公器将沦为私有。奏折呈递后，乾隆帝受到很大震动，立刻革去彭元瑞现有的职务，降职为礼部侍郎。

初彭龄的胆识和魄力，给老迈的乾隆帝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当年五月，他将初彭龄调为兵科给事中，专门负责弹劾纠察。在这些岗位上，初彭龄查处蠹虫，廓清政风，令本已暮气沉沉的官场面貌一新。

这一切，都被尚为储君的嘉庆帝看在眼里。他平静地观察官僚群体，挑选自己日后整顿吏治所能倚赖的大臣。

嘉庆元年（公元1796年），嘉庆帝让初彭龄出任主管机密案件的通政司参议。当年十一月，初彭龄赴江西公干时，在民间微服出巡，闻听有民谣传唱。他有心记下了民谣的内容：“江西地方苦，遇见陈老虎。中缺要八千，大缺一万五。过付是何人，首县名徐午。”接着初彭龄了解到，这是百姓为讽刺江西巡抚陈淮所作。陈淮通过南昌县知县徐午作中间人，狼狈为奸在江西大肆卖官鬻爵。而花钱买官者上任后，当务之急自然不是为民谋利，而是竞相搜刮钱财，期望收回买官成本，闹得江西各地怨声载道。嘉庆帝接到初彭龄奏章后，一面令他再赴江西详细调查，尽量获取充足的证据；一面将陈淮先行革职，由两江总督兼。为了打消初彭龄“小官劾重臣”的疑虑，嘉庆帝还特意下旨勉励他“不必心存畏惧”，只要一心查案即可。经过调查，陈淮贪赃枉法的证据大白于世，随即被贬往新疆戍边赎罪。初彭龄也因累参重臣，“风采振动一时”。

嘉庆帝即位后，最为忧虑的是乾隆后期愈演愈烈的吏治危机。当时朝堂上下沆瀣一气，贪腐之风愈发炽盛，而敢于和此斗争的人却极少。嘉庆帝见初彭龄虽居下僚，却不惧危险屡次参劾重臣，自然欣赏不已，把他视为除弊能臣。所以皇帝先委任初彭龄为福建学政，不久将他调回，补为兵部侍郎，又授云南巡抚，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。初氏短时间内能屡次超迁，引得朝臣瞩目。

嘉庆帝选派初彭龄坐镇云南，其实是为了监督任意妄为的西南高官。在初彭龄获任几乎同时，皇帝把云贵总督富纲调为漕运总督。皇帝的有心之举，初彭龄心如明镜。在临别召对时，嘉庆帝对他面授机密：“富纲历任巡抚总督，声名平常。只因贪婪实迹尚未败露，不好加以严谴。”初彭龄领旨赴任，到云南后就详加访查富纲劣迹，很快掌握了他的贪腐证据。不久，富纲贪婪腐化、腐化官风的情况，由初彭龄奏呈嘉庆帝。富纲调任漕运总督后，为了打探情报防止罪行败露，甚至私拆军机处发往云南的公文，引发皇帝强烈不满。随着案情的逐渐明朗，富纲被判处死刑，家产也被查封。

初彭龄到任云南后，一直致力于选贤任能，澄清当地政风官风。经过他的努力，云南官场终于政风肃静，地方也得以安宁。一年多后，初彭龄因双亲在堂无人供养卸任返京。云南大小官员获悉此事后，联名上密折挽留，他们动情地说：“（初彭龄）到任一年有余，为官清介，实惠在民，滇省风气为之一变。若能假以年月，则滇省元气可恢复。如果突然更换他人，难免大失滇省无数赤子之心。”嘉庆帝接到奏折后，颇为感动，他在回复中道：“督抚久任方能有成。初彭龄自任滇抚以来，于地方公务锐意整顿，效果众所周知。但因其父母年逾古稀，体弱多病，无人在身边照料。朕方以孝治天下，所以才同意他改补京职。”

回京后，初彭龄继续参劾着腐败官员。贵州巡抚伊桑阿骄纵勒索，逼得百姓逃入深山，与官府周旋。云贵总督琅玕本负监督之责，却徇私包庇，以致伊桑阿有恃无恐。初彭龄借在贵州核查账目的契机，弹劾伊桑阿不法罪行有三：肆口谩骂沿途州县，随意添加拆改衙署，勒索地方无度。嘉庆帝训斥云贵总督琅玕：“（此事）若非初彭龄据实奏闻，则伊桑阿贪黩营私竟被置之不顾。尔等本为满官，曾不若离任之汉巡抚秉正不阿据实参奏？”琅玕被拔去花翎降为二品顶戴，暂留云贵总督以观后效，伊桑阿则被斩首。

嘉庆八年，初彭龄奉命清查陕西军需账目。若在平时，这只是走过场的例行程序而已。陕西巡抚秦承恩也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，只是礼节性地接待陪同。没想到初彭龄到任后，对所有账目清查核对，发现了虚报冒领等各项问题，并据实上奏朝廷。巡抚及以下官员，或被罚垫赔，或降职调任。

初彭龄的反贪，取得了诸多成绩，却也埋下了巨大隐患。不久，他就几乎死于非命。

遭人构陷几陷死

危机在初彭龄不知不觉中悄然接近。

嘉庆九年，湖北两位封疆大吏陷入纷争。他们彼此不和，互相攻讦。先是湖北巡抚高杞因违例调补知县，被湖广总督吴熊光上本参劾，高杞因而被降级留任。他怀恨在心，酝酿着借机报复。趁着和初彭龄会面的机会，高杞充分发挥胡编乱造的能力，将吴熊光所谓结党营私、受贿贪赃等事说得绘声绘色。一向嫉贪如仇的初彭龄觉得事关重大，在得到高杞“属实”的承诺后，立刻上疏参劾。嘉庆帝也颇为重视，召初彭龄亲自询问，要他对此事严加核实，尽快掌握证据。几日后，高杞询问事态进展，初彭龄未加详虑，便将嘉庆帝的嘱托告知。没想到高杞自以为阴谋得逞，得意忘形，四处宣扬，以致闹得朝堂喧腾，谣言四起。

吴熊光内心也不能自安，上疏为自己申辩。嘉庆帝为安抚他，派员前去核查，发现所参之事都是子虚乌有，而泄漏此事者正是初彭龄。嘉庆帝恼怒初彭龄一面弹劾贪官“欲博侃直之名”，一面私下泄露机密“藉张声势”，认为“其心不可问”，立刻将他革职，交刑部看守审问。

诬告和泄密，其事可大可小，具体尺度由负责审讯大臣来把握。初彭龄因勇于弹劾官员，让同僚胆战心惊，人人自危。如今他落难，不仅无人施援手，甚至集体落井下石，最后竟然以死刑结案。

审判结果初拟后，牢狱中初彭龄的反应不得而知，而金銮殿上的嘉庆帝则大吃一惊。他深知如此重判，是同僚对初氏的排斥和报复。

在嘉庆帝心中，初彭龄反腐出于公心，此次虽有谬误，但罪不致死。为了挽救他的性命，嘉庆帝不惜写了一道长长的上谕，他在文中不厌其烦地分析初彭龄所犯之罪的性质：“初彭龄确实贸然参劾，但他陈奏失实的罪名，并不一定成立。毕竟朕从不因言事而怪罪他人，初彭龄轻信他人之言，并无主观故意。泄露内廷机密确实有之，但按律处罚也不过是革职贬戍而已，何故要处之极重的刑罚？”嘉庆帝甚至还不忘敲打审讯大臣：“卿等试扪心自问，平日真无泄漏内廷奏对之举？若因此重罚初彭龄，岂非朝廷多人都要定重罪？”嘉庆帝最后敲山震虎：“朕从不因言事罪人，最喜敢言之臣，这是你们素来知晓的。可你们明知如此却执意判他死刑，是否因有不可让人知事，害怕为他知晓，进而弹劾你们……”这篇手谕长达1000余字，既有苦口婆心的劝解求情，也有雷霆之怒的敲打警告，可见用心良苦。在皇帝的强势介入下，初彭龄最后仅被革职，也没有按例流放新疆，而是网开一面以“官声素著、双亲老迈”为由，令其在家闭门思过。

嘉庆帝的宽宥，为初彭龄再次起用埋下了伏笔。

复出反腐心不改

初彭龄被革职，朝臣之间不免有弹冠相庆者。而原先稍微缓和的吏治危机，又随即严峻起来。忧心忡忡的嘉庆帝，对初彭龄的想念也日益强烈。

一年之后，皇帝开始酝酿重新起用初彭龄。他先在诏书中，对初氏此前的功绩回顾一番，“初彭龄前任御史时，遇事直言，不甘缄默。擢任巡抚，办理地方事务，也是认真负责”。不久，嘉庆帝又下诏为初氏此前的罪行开解：“上年参劾吴熊光操守平常，也是因高杞散播谣言，所以才上疏弹劾，是受到谎言愚弄的缘故。”做好这些铺垫后，嘉庆帝顺势下诏：“念初彭龄平日官声尚好，本日所出右庶子一缺以初彭龄补授，以示朕终不废弃敢言之臣，希望能对朝政有所裨益。”

当年十二月，初彭龄补光禄寺卿，后兼署左右副都御史事，重新肩起反贪重担。

复出之后，初彭龄奉旨赴青海西宁查办贪腐，同时路经山西与巡抚筹划盐务。一路之上，嘉庆帝时常下旨表达对他的期望：“曾任巡抚，今复任大员，心地明白公正……”

回京后，初彭龄升任安徽巡抚，赏顶戴花翎。接巡抚印后，嘉庆帝下旨勉励他：“永守素衷，为国宣力，诸事宜加精细。”而且不忘叮咛他以前事为鉴，提高侦破谎言的能力，“人情诈伪难测，须防言行不符之辈，勉之”。皇帝对他的关心与期望，一如从前。

嘉庆十二年，安徽寿州发生3人中毒身亡事件。该案因牵涉官员，屡次翻供，久久难以结案。后经初彭龄亲自核查，发现该案涉嫌腐败，长洲知府周锷、知县赵堂、万承纪被革职查办。初彭龄的处理，深得嘉庆帝的赞许。他在谕旨中向大臣告诫：“以初彭龄为法，必能永承恩眷，为大员者，非一清字所能概括，勉思整饬吏治为要，姑息二字，切须痛改勉之。”

嘉庆十四年，初彭龄授山西巡抚。到任不久，即参劾前巡抚成龄借巡阅之名，勒索地方，致使仓库出现亏缺。不久，初彭龄又参奏按察使张曾献承审要案，任意拖延；汾州知府王彝象、孝义县知县葛拱宸抽换卷宗，徇情枉断；文水县知县陈廷圭失察捕役，诈赃毙命，复行贿和；汾阳县知县李景阳延案不结，致酿人命；绛州知州杨映权、阳曲县知县吴安祖官声平常，并查明各属亏空，请一并治罪。初氏一气弹劾多位官员，在山西掀起了一股弹劾旋风，令当地官员人人自危，心生不满。

初彭龄石刻像

后来初彭龄调任陕西巡抚。山西河东道刘大观见他离任，以初彭龄在巡抚任内任性乖张为由，罗织数项罪名联名参劾。嘉庆帝派员赴山西调查，并命初彭龄回山西听候结果。经过朝廷钦差的调查，初彭龄在山西任内，所参奏之事多半属实，但也存在漏报现象。因山西官员的强烈要求，初彭龄再次被革职，只以四品京堂补任。这是他仕途的第二次挫折。

雷霆荣宠一念间

很快，纷繁复杂的贪污案件，又让初彭龄有了用武之地。他先授命查办长江河堤工程贪污案，接着又被派往福建审案。因为办事得力，升迁工部右侍郎，当月即奉旨赴湖南查湖广按察使周季堂案。

嘉庆十九年，两广总督弹劾广西巡抚成林公务废弛，侵扰地方，勒索属员。初彭龄奉旨往广西查案，查出成林恣意声色，生活奢靡，挥霍无度，致府库亏空白银30万两。成林被抄家，发往新疆戍边。

当年，初彭龄因办案得力，升为兵部尚书，并署理江苏巡抚。在苏抚任上，初彭龄和两江总督百龄、原江苏巡抚张师诚因政见不同，矛盾重重。双方势同水火，互不相让，互相弹劾，嘉庆帝起先尽力调解，后见并无成效，各打五十大板。不久张师诚勾结吏部官员，以参折不实的罪名诬告初彭龄。嘉庆帝起先尽力为初彭龄申辩，决定不革职留任，令其候补内阁学士。但不久初彭龄上折要求留任从前的臣僚，被言官弹劾目无朝廷纲纪，随即众官上疏，要求严惩。在朝臣的压力下，事态急转直下，初彭龄当月被降补为翰林院侍读侍讲。三月，皇帝下诏，指责初彭龄性格偏激，难以与百官和睦，按律本应发配新疆，念其母年近九旬，姑且革职留京，“闭门思过，不准出门，若再妄为，定不轻恕”。初彭龄第三次被罢黜，在嘉庆时代再难有所作为。

到了嘉庆二十四年，值嘉庆帝六十大寿。初彭龄奉上颂诗，嘉庆帝藉此宽宥了他的罪责，委他为员外郎，但还只是个低级官员，并无多少实权。

初彭龄的再次起用，是新帝道光登基后。道光元年（公元1821年），刑部员外郎初彭龄受赏礼部侍郎衔，不久又署理礼部左侍郎。当年七月，初彭龄署理礼部右侍郎，次月复任为兵部尚书，十二月，又兼署工部尚书。在不到一年时间里，初彭龄便从没有实权的员外郎一跃而为工部和兵部的最高官员。次年三月，道光帝还赏给他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殊荣。但因为年逾七旬，看透官场倾轧，此时的初彭龄几乎无所作为。道光四年，他因年老休致，受赏半俸，翌年七月谢世，道光帝赐祭葬。

相关阅读·

初彭龄受嘉庆帝的信任，在官场掀起一股反贪旋风。他纠弹重臣，弹劾权臣，对扭转官场风纪起到了一定功用。但在日益恶化的吏治风气下，曾经锐意反腐的嘉庆帝也陷入茫然、萌生倦意，清王朝也就此沉沦衰朽。

“无疾而终”的嘉庆反腐

□ 本报记者 鲍 青

乾隆六十年，年逾八旬的老皇帝决定将皇位传给第十五子颙琰，也就是后来的嘉庆帝。

嘉庆是年35岁，正是精力充沛、年富力强的时期，由他来主政一个庞大的帝国，切合时宜。

但压在嘉庆肩上的担子，却一点都不轻松。从乾隆后期开始腐化的吏治，已经开始出现溃烂的趋势。从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，朝廷每侦破一个贪腐大案，往往都是“办一个，查一串；查一个，带一窝”，官员集体腐败现象触目惊心。乾隆年间爆发的甘肃冒赈案，便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代表。

清代在甘肃为了筹集粮草，以备荒年赈济或兵事所需，曾实行过“捐监”政策，凡是想取得国子监监生资格的读书人，可以通过向当地官仓捐交谷物来实现。但因为捐监容易滋生腐败，一度被清廷叫停。但到了乾隆三十九年，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时，这项政策又再度复活。他以甘肃仓储不足、可用“捐监”粮米赈济灾民为由，说服了陕甘总督，让他代为请示朝廷。皇帝批准了这项要求，甘肃各地自此捐监再开。

但开捐之后，王亶望却私自将应收的豆麦全部折合成白银，这为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提供了极大便利。此后每年甘肃都向朝廷谎报灾情，不仅骗取朝廷赈济，还通过虚开赈灾粮款，官员坐收其利。在王亶望的运作下，几乎整个甘肃官员都参与其中。案发后，连乾隆帝都惊呼“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”。

就是在这种腐败的吏治氛围中，嘉庆帝接过了治国的重担。嘉庆四年，他出人意料地将乾隆后期首席重臣和珅查办。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随即展开，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。

以诛和珅为引线，新皇帝的一缕缕治国新风，绵绵不断地吹散开来。人们发现，这是一位和先皇作风截然不同的皇帝。乾隆坐享康雍两代人的勤奋积累，经济欣欣向荣，社会财富大为增加。乾隆帝早年虽勤政节俭，愈往后则愈发好大喜功、穷奢极欲。他自诩“十全老人”，有十全武功，又在文化上修纂《四库全书》，还多次巡幸江南，每一项都是骇人听闻的奢华消费。到了乾隆晚年，积累的社会财富已经被挥霍殆尽，已经到了寅吃卯粮的地步，而人口的激增又让垦荒变得难以为继，官僚群体的腐败又加重了统治危机。

嘉庆帝敏锐地捕捉到了江山动摇的信号。他要革除吏治积弊，以清除奢侈的根基。他先削减皇室祭天的规模和陪同人员，再禁止大臣向他进贡古玩字画，以期扭转财政困局。乾隆时期，大臣争相向自诩文章皇帝的乾隆进献字画，以博取宠幸。嘉庆帝则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，向皇帝进贡古玩字画，除了助长贪风之外，别无一丝益处。

不久，嘉庆帝接到汇报，上年底采解的一块玉石，因道路崎岖，难以按时抵达京城。嘉庆帝要求：“一接此谕，不论玉石行至何处，即行抛弃。”玉石虽美，却和民生无涉，他并不将其作为有价值的东西。

接着，嘉庆帝开始治理官场腐败。但此后他发现自己似乎坠入了一个无尽深渊。无论自己发什么雷霆之怒，整治多少官员，官僚都是惰性依旧，始终难以复制祖父雍正帝的反贪辉煌。

嘉庆帝先在官员中物色清廉者，对他们委以重任，让他们放手整治贪腐。初彭龄这样的官员，毕生致力于参劾贪腐官员，在污浊的古代官场，如果得不到嘉庆帝的保护和支持，是很难有所善终的。在嘉庆帝的治理下，全国十一个总督中，六个因贪腐而被撤换，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，朝廷风气有所改观，而一些清廉实干的官员也得到提升，成为可以依靠的股肱能臣。

然而，反腐的高潮刚过，似乎就很快一切如旧。在地方，因为潜规则取代了显规则，各地官员，从上到下，从大到小，仍然收礼送礼、买官卖官。各地衙门也仍然懈怠昏庸，对民间疾苦漠不关心。

更为严重的是，从乾隆晚期开始的地方财政亏空开始蔓延。起先是一些地方财政入不敷出，出现亏空，不得不负债经营。而到了嘉庆时期，随着隐性贪腐的蔓延，地方亏空成了各地普遍现象。为了维持运转，各地必须靠借债度日，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起高利贷。在无计可施之际，他们只能将敛财的黑手伸向百姓，又加剧了官民冲突，激化了统治危机。

坏消息一个又一个地传来，让嘉庆帝难以安眠。他苦思解决之策，决心加大反腐力度，几乎每月都有人事调整。腐败官员不断被揪出，但腐败的势头却没有丝毫减弱，基层的财政危机也没有得到缓解。耐性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，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、抱怨甚至痛骂。他痛斥群臣：“诸臣全身保位者多，为国除弊者少，苟且塞责……自言堂官不如司官，司官不如书吏……国事尚可问乎？”

国事愈发不可问了。嘉庆十八年，嘉庆帝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途中，收到两百多名天理教徒联合太监突袭皇宫的消息。这次意外，给了嘉庆帝极大的精神刺激，他在诗文中多次提及此事，都是充满着不解和悔恨。

此后，吏治越来越松懈，嘉庆帝已经回天乏术了。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，竟然发生了兵部大印被盗的滑稽事。而风起云涌的底层起义，给衰朽的清王朝敲响了丧钟。